

大合流. 大悖论. 大觉醒—理解美国政治的三本书

崔之元

编者按：2021年1月20日，美国勉强完成了总统权力的和平移交，但华盛顿特区的国民警卫队至少要到3月份才会撤出，其官方理由是为了确保2月8日美国参议院将开始的对特朗普的弹劾的平稳进行。对已经卸任的总统还进行弹劾，虽然在合宪性上很有争议，但其政治含义是不让特朗普今后再有参政机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特朗普的7400万支持者选民对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的作用。无论我们的价值立场如何，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诉求，对研究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均有重大意义。正如布朗大学非裔美国经济学教授 Glenn Loury(https://www.brown.edu/Departments/Economics/Faculty/Glenn_Loury/louryhomepage/) 所说，特朗普本人只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关键在于理解他的支持者代表的政治地基的“板块漂移”(tectonic drift)。本期公号介绍三本有关著作，分别是“大合流”，“故土的陌生人”和“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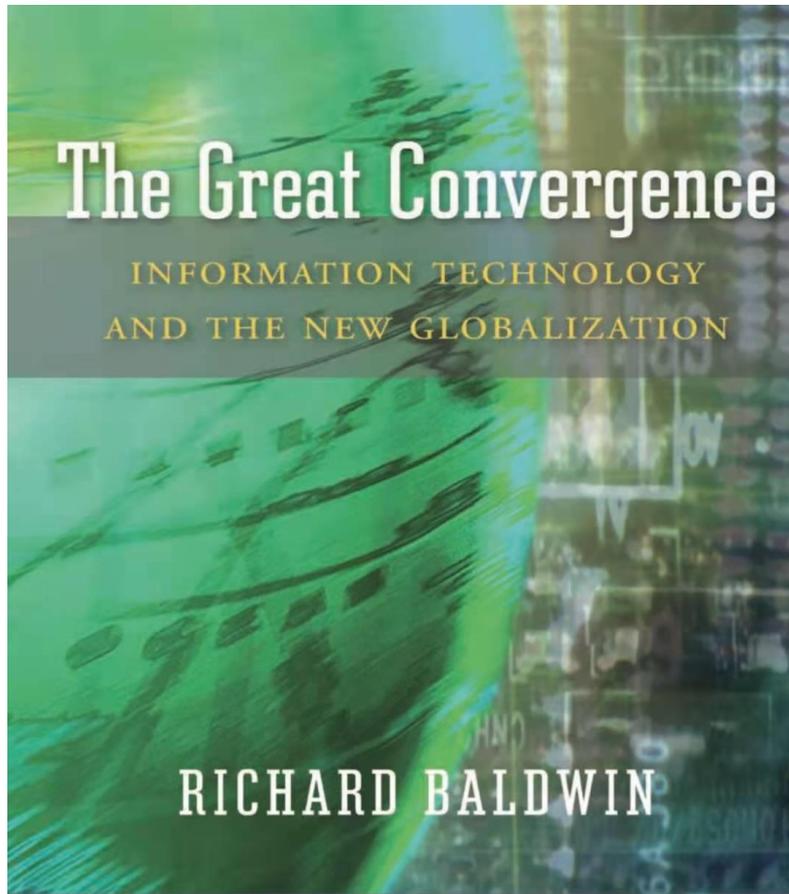
(三本书中译本的封面)

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是“铁锈带”(Rust Belt)的失业或受到失业威胁的制造业白人工人阶级。



(“铁锈带”的地图)

这一观点不无道理，特别是 2016 年大选中白人工人阶级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如属于“铁锈带”的宾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部分选区）对特朗普的支持可能是他当选的决定性因素。但“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 7400 万选民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理解制造业全球布局变化的机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介绍的第一本书“大合流”就是研究 1990 年以来新型全球化（全球产业链）的一部精彩著作，2016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瑞士国际关系和发展学院的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教授。



(Baldwin 的英文版封面)

鲍德温的主要洞见是从“三级约束”（Three-Cascading-Constraints）来理解全球化进展的机制。人类交往活动受到三种成本的约束：交通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在历史进程中，三种约束条件渐次放松。1820 年以前，由于三种成本都极高，人们基本上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内，除了少数贵族，大多数人的生产和消费都被捆绑在同一地点（例如，英国普通人 19 世纪之前很难享受到印度和中国的茶叶）；1820 年之后，由于蒸汽机和蒸汽船以及铁路的技术创新，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出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First Unbundling），但思想交流成本和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仍然很高，电报和固定电话的发明还是不能把思想交流的成本真正降下来。因此，生产和消费的第一次松绑导致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全球化，即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加大了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差距。1990 年代之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革命带来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信息技术的发展遵循摩尔定律，即计算能力呈现指数增长，芯片的性能每 18 个月就会翻倍。而吉尔德定律则表明，带宽的增长速度要比运算能力的增长快三倍，即每 6 个月就会翻倍。梅特卡夫定律进一步指出，一个局域网对用户的效用和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由于第二种约束条件（思想交流成本）被信息与通信技术

所放松，全球范围的生产协调成为可能，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Second Unbundling）带来了“大合流”（The Great Convergence）的新型全球化，即发达国家纷纷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如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苏州等地组装），从而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其它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收入的差距。实际上，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收入的比重已经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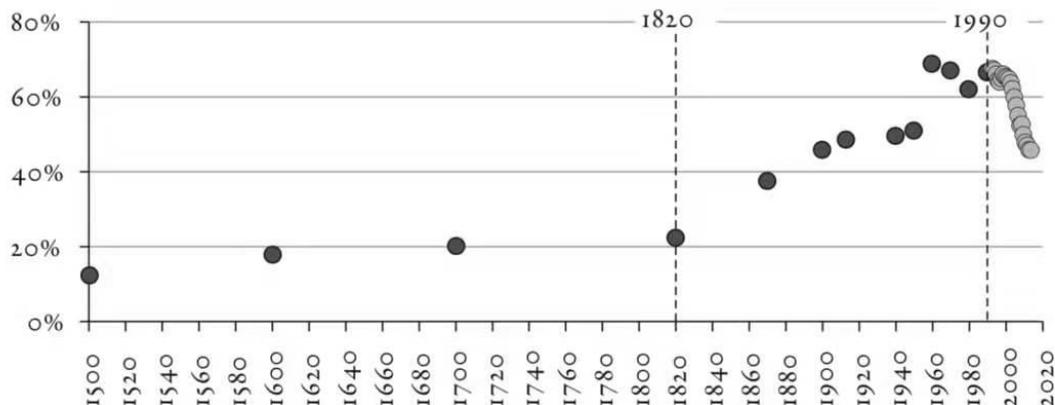


FIGURE 1: Globalization changed around 1990: the “shocking share shift” (G7 share of world income).

图 1 显示，1820 年到 1990 年间的“第一次松绑”时期，G7 发达国家的收入占全球收入之比从 20% 上升到 67%，但这一比重在 1990 年后的“第二次松绑”时期逐年下降，目前已经回到 19 世纪初期的比重。类似地，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也发生了惊人的逆转，如鲍德温的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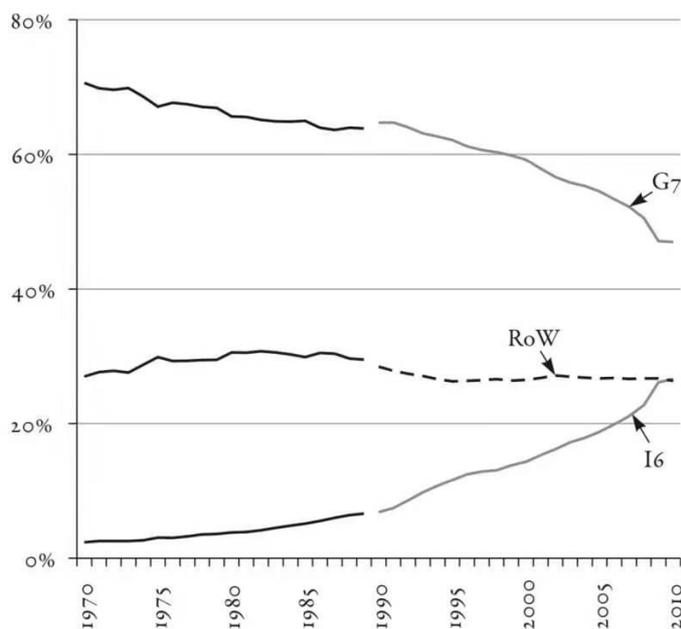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decline in rich nations’ share of world manufacturing translated to gains by just six developing nations.

图 2 显示，G7 发达国家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 1970 年前的 70% 下降到目前不到 50%，而 G7 所丢失的份额几乎都被 6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I6）获得，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图

中的 RoW)的制造业份额则从 1990 年以来没有什么变化。在 6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中，中国的制造业份额增长最为突出，从 1970 年的 3%上升到目前的 20%左右。

有趣的是，为什么 1990 年以来“第二次松绑”时期的全球制造业转移主要集中在 6 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呢？鲍德温认为，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虽然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但还是未能放松第三种约束，即人本身流动的成本。一般性的跨国生产协调可以通过手机和电邮来解决，但重大决策和关键技术协调还是需要面对面的沟通。飞机飞行时间的约束和管理者和工程师的海外费用，导致跨国公司采用“小范围，高密度”的选址方式，这就是生产和消费的“第二次松绑”只使得少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快速工业化的原因。

令人兴奋的是，鲍德温指出，“第三次松绑”已经初显端倪，即降低人本身流动的成本的技术已出现，只是目前还十分昂贵。“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和“远端现身”（telepresence）技术将实现劳动者和劳动服务的地点上的分离，当中国工程师可以通过“遥控机器人”修理非洲国家进口的中国设备时，“大合流”的全球化就可以惠及所有国家。

但是，在这一“大合流”的美好图景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阶级相对受损是一个事实，如鲍德温上面图 2 所示。他们支持特朗普的把制造业带回美国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过，“铁锈带”的白人工人阶级显然只是全美支持特朗普的 7400 万选民的一小部分。为了解对特朗普的支持的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需要介绍第二本书“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SECOND SHIFT*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Our Political Divide

(“故土的陌生人”英文版封面)

此书 2016 年由位于纽约的“新出版社”(New Press)出版，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莉·霍赫希尔德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教授。她从 2011 年开始，用了 5 年时间在路易斯安那州对“茶党”(Tea Party)成员进行访谈。“茶党”是 2009 年兴起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2010 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成立了“茶党党团”(Tea Party Caucus)。有些学者认为，茶党运动是受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美国第二大非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出资的智库操纵的，霍赫希尔德通过深入访谈，认为这种看法至少是很不全面的。茶党的基层群众基础是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救助政策(bailout)的反弹。该政策用政府的税收救助了大银行和大企业，却没有减免普通居民的住房抵押贷款，这就强化了茶党的基层群众的反对“大政府”的倾向。

霍赫希尔德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大悖论”(The Great Paradox)：受惠于政府医疗补助的基层茶党群众却反对奥巴马医保方案，受害于污染企业的人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受益于联邦政府税收转移支付的“红州”却要求降低联邦所得税税率，受垄断企业之害的小企业主却和垄断企业一样反对政府监管。这是否说明茶党成员都是些

“不可理喻”之人呢？

霍赫希尔德并不这样看。她在书的序言中说，“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身处进步主义阵营，但近年来，我开始想更好地了解右派人士。他们是如何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我们能否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奋斗目标？”五年间，通过对4个焦点小组共40人的访谈，以及对另外2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教师，社工，律师和政府官员——的访谈，并辅之以和芝加哥大学“综合社会调查”(GSS)统计分析的对照，她发现理解茶党成员（他们在2016年都投了特朗普的票）的关键在于“深层故事”(“The Deep Story”)，从而解开了“大悖论”之谜。“故土的陌生人”的第九章的题目即是“深层故事”，其中一些段落值得较详细地引用：

“深层故事是个“感觉仿佛”(feels-as-if)的故事——这是一个情感讲述的故事，以象征为语言。它无关看法，无关事实。它告诉我们对事情的感受如何。这样一个故事令政治光谱两端的人们都可以退后一步，探索另一端人们看待世界的主观棱镜。我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便无法理解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我们都有深层故事...

茶党的深层故事聚焦国家边界内各社会群体间的关系。我构造了这个深层故事，以隐喻的形式描绘与我交流过的人们，其生活中的希望、恐惧、骄傲、耻辱、愤恨和焦虑。然后我在我的茶党朋友们身上做了测试，看看他们是否认为这符合自己的经历，答案是肯定的...

你耐心地排在一条长队中，宛如朝圣，队伍通往山上，你位于队伍中间，与你站在一起的也是信仰基督教的年长白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其中一些有大学学历，一些没有。

一过山顶便是美国梦，这是队中每个人的目标。排在队伍后面的许多人是有色人种——贫穷，有的年轻，有的年长，大部分没有大学学历。回头看很吓人，你后面有很多人，原则上你希望他们一切顺利。即便如此，你已经等了很久，工作努力，队伍却几乎没有挪动。你理应前进得更快一点。你很耐心，却有些疲惫。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尤其是山顶的那些人...

骄阳似火，队伍没有动。抑或其实是在向后倒退？你已多年未涨过工资，也没听说未来有此可能。事实上，如果没有高中学历甚至本科学位，那么过去二十年，你的收入是下降的。对你的朋友们而言，情况亦是如此；实际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停止了寻找理想工作的努力，因为他们感到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好工作并不存在。

面对坏消息，你很从容，因为你是个积极向上的人。你不喜欢抱怨，总是心怀感恩。你希望自己能给予家人和教堂更多帮助，因为那是你心之所在。你希望他们会感激你的付出。但队伍没有挪动。在付出极大努力、做出巨大牺牲后，你开始感到自己停滞不前。

你想起自己的骄傲——比如你的基督教道德。你一直坚持正派生活、一夫一妻、异性婚姻。这并非易事。你已经历过一次分居，差点——或真的——离了婚。自由派现在说你的想法过时了，是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可他们的价值观不甚明了。在当下世俗宽容的环境中，你想起过去的好时光，当你还是个孩子时，在公立学校、要进行晨祷，向国旗致敬，然后说出“在上帝之下”这句誓词...

看！你看见有人在你前面插队！你遵守着规则，他们却没有。他们插队，你就像在向后退似的。他们怎么能这样？他们是谁？有些是黑人。由于联邦政府推动的平权行动计划，他们在高等院校入学、实习、就业、福利金、免费午餐方面获得了优待，在人们心中占据了一定的秘密位置，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女性、移民、难民、公共部门职员——哪里才是尽头？你的钱从一个自由派的同情滤网中漏了下去，你无法控制，也不赞同。这些是你年轻时也梦寐以求的机会——如果你年轻时不曾拥有，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应享有。这不公平”。（“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155页）

可见，在排队实现“美国梦”中出现“插队者”，是霍赫希尔德发现的茶党的深层故事的关键。“插队者”可以是移民，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甚至可以是植物（因为环保而失去就业机会）和机器人。而“插队”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因此茶党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减低政府所得税，阻止向“插队者”的再分配。从这个视角，霍赫希尔德破解了“大悖论”：为何受害于污染企业的茶党成员却投票支持要求撤销联邦政府环保署的共和党议员？因为只要环保监管减少了就业，就必然相应增加政府的福利支出，而这就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税，而增加的税收又会帮助更多的“插队者”。

至此，霍赫希尔德终于穿透了她所说的“同理心之墙”（empathy wall），理解了茶党成员为何抱有似乎“大悖论”的看法。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作为美国东西海岸自由派左翼精英的一员，霍赫希尔德响应了中国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知识分子应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调研美国中下阶层的茶党成员（但茶党不是最底层，他们反倒认为最底层中有不少“插队者”）。在书的结尾部分，霍赫希尔德给她的自由主义左派朋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为何不去认识些你政治圈子以外的人呢？别管安·兰德；他们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她的作品让你以为他们自私透顶，但你不会碰到这样的人。你或许会遇到一些很好的人，关于邻里关系密切的社区、毅力和韧性，他们会教给你很多。

你可能以为，有权有势的右翼组织者在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为吸引右翼草根追随者“上钩”，迎合了他们本性中的**坏天使**——他们的贪婪、自私、狭隘的种族观、同性恋歧视、摆脱为穷人交税的愿望。如我在新奥尔良的特朗普集会所见，其中一些因素的吸引力犹在。但它掩盖了另一种吸引力——针对的是右翼的**好天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他们耐心地站在队中等候；他们忠诚、甘于牺牲、坚韧不拔——这些是深层故事自我的优良品德。

想一想，也许你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会与他们的看法更相近。”（“故土的陌生人”中译本第262页）

但如果我们继续这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可以说霍赫希尔德也接受了中国文革的教训，她并不认为“贫下中农”的看法就都是正确的。这反映在调研结束时她给茶党右派朋友们的一封信中：

“许多进步自由派人士对我国的政治选择并不比你们更满意。而且许多人在你们的部分深层故事中看到了他们自己。一个六十岁的白人女性——她住在旧金山，是个小学老师——这样说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嘿，我赞同排队的那部分。”我明白你们脑海中的目标——生机勃勃的社区生活，充分就业，劳动的尊严、自由——但你们接受的政策会实现那些目标吗？当然，你们想有好工作和高收入。你可能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但在收入和就业方面，民主党人的历史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比如，在《牛市、熊市和投票箱》（Bulls, Bears, and the Ballot Box）一书中，鲍勃·戴特里克（Bob Deitrick）和卢·戈德法布（Lew Goldfarb）指出，过去八十年，在12项经济指标中，有11项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的表现优于共和党人治下。话虽如此，从其他方面看来，党派间的区别并不明显。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开启了一个放松监管的时代，此举通常受到右翼支持，而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则推行了如今一般为左派青睐的环境监管政策。

还有，路易斯安那人，看看挪威吧。那是个资本主义民主小国，人口500万，与路易斯安那州相当。这个国家有长长的海岸线，其人民与你们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船只和捕鱼。和你们一样，挪威也有石油。但路易斯安那州和挪威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治理哲学和自由观，挪威人对民选官员的期待值很高，得到的也很多。挪威有世界上最大的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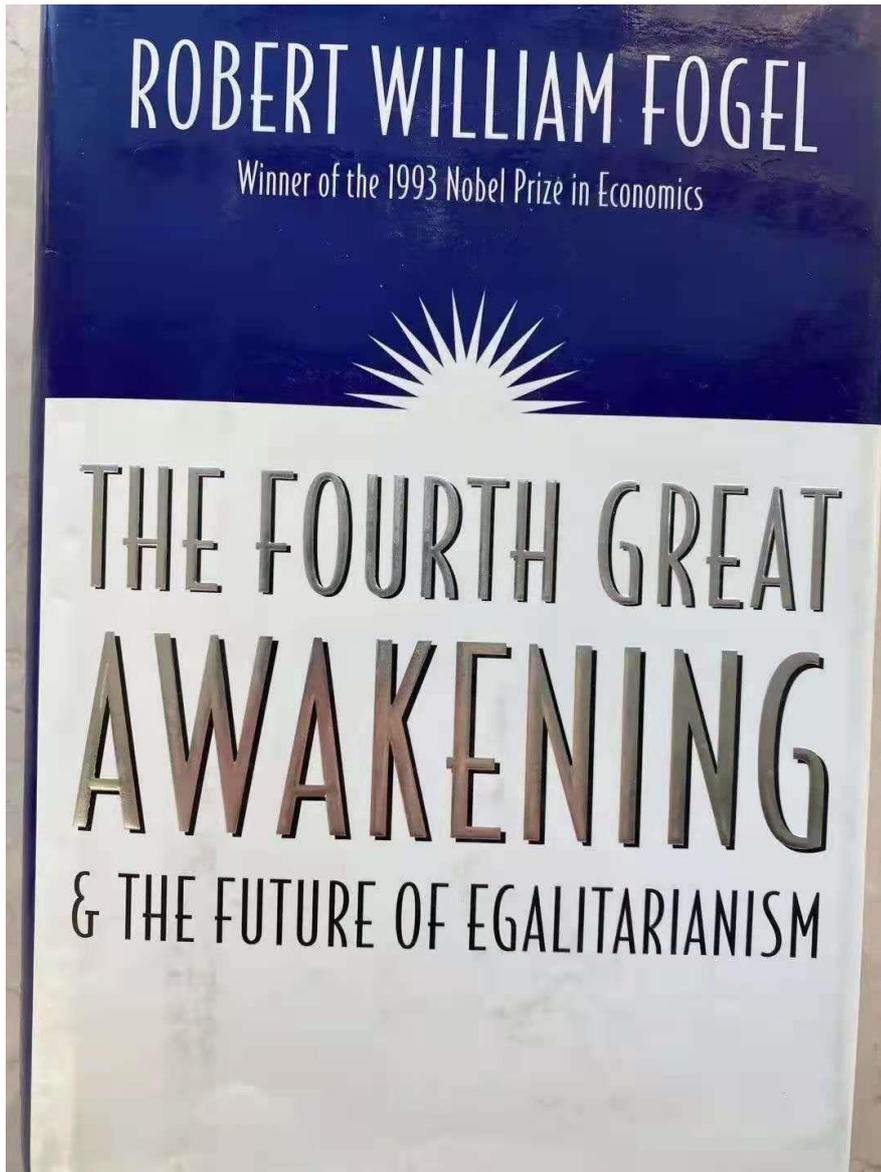
财富基金——8000亿美元——而且绝大多数挪威人都过着中上层阶级生活。他们享受着这种富有带来的卫生、教育和总体幸福感方面的高分，享受着不匮乏的自由。我们美国人有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我们最为擅长的是借鉴世界各地的好点子。从长远来看，我们也许能把自己从石油中解放出来，但与此同时，作为鲍比·金达尔（路易斯安那州前州长，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bby_Jindal）路线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怎样将路易斯安那州从其悖论中“解放”出来也值得我们探究。

等你们逐渐了解进步派后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深层故事，与你们的类似，他们感到你们可能会对其产生误解。在这个深层故事中，人们站在一个大型公共广场周围，广场里有创造力十足的儿童科技博物馆、公共艺术与戏剧演出、图书馆、学校——最先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可供所有人使用。他们对此充满自豪。其中一些人是其建造者。外人可以加入广场周围站立的人群，因为许多现在的圈内人也曾是局外人；吸收及接纳异己似乎是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价值观。但在自由派的深层故事中，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强盗闯进了公共广场，对其大肆破坏，自私地偷走了广场中心公共建筑的砖头和混凝土块。雪上加霜的是，守卫公共广场的人们眼睁睁看着破坏分子用那些砖头和混凝土块建起私人高楼大厦，将公共领域私有化了。那便是自由派深层故事的核心要点，而右派无法理解自由派对他们设计新颖、来之不易的公共领域深深的自豪感——自由派将其视为美国生活中一支强大的融合性力量。讽刺的是，你与左派的共同点可能比你想想中更多，因为左派中的许多人也感到自己像故土的陌生人。”

霍赫希尔德在书的结尾中寄希望于左右派基层群众在一些议题上先合作起来，她特别引用了她的伯克利同事罗伯特·莱希（Robert Reich，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时的劳工部长）的类似看法：“考虑到我们不同的深层故事，左派和右派聚焦于不同冲突及与之相关的各自的不公平观。左派将目光投向私营部门中1%的上层社会及99%——在这群人中，一个下层社会正逐渐诞生。对自由派而言，这是冲突爆发点所在。右派将目光投向公共部门，将其视为一个服务台，服务对象是日益壮大的闲散“索取者”阶层。罗伯特·莱希曾指出，一个更基本的冲突点在第三个地方——在平民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竞争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美国政治中的重大分歧，”莱希预言道，“将从民主党对共和党转向反建制对建制。”分歧在于“是否认为游戏被操纵”。”

除了削减联邦政府税率之外，茶党成员最关心的另外两个议题是基督教和荣誉。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五旬节教会里，霍赫希尔德惊讶地发现欧洲中世纪教会的“什一税”依然存在，即教会成员要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茶党成员不情愿交税给联邦政府，因为他们认为税收被用于救助大企业和大银行以及帮助“插队者”，而宁愿把钱给教会用于社区福利和济贫事业。他们非常看重来自就业的荣誉，忍辱负重也不去举报污染企业（因为担心政府关闭企业），心目中以西部电影中的孤胆英雄为榜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黑格尔哲学专家Robert Pippin教授指出，西部电影有助于理解茶党（“Tea Party as Western Movie”，http://voices.washingtonpost.com/political-bookworm/2010/06/tea_party_as_western_movie.html）。

宗教和荣誉问题都是人的精神追求，这样我们就自然转到对第三本书“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的介绍。



（“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的英文版封面）

此书是1993年和诺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Robert Fogel,1926-2013)教授于2000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中一些基本思想在福格尔1999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任演说时已经有所表述。在他之前，以布朗大学麦克洛克林(William McLoughlin)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划分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宗教大觉醒”，福格尔则将“宗教大觉醒”的历史学文献和关于美国“政治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的政治学文献综合起来，提出了美国的四次“宗教-政治周期”。因此，他的“大觉醒”概念是指“宗教-政治周期”，而不是单纯的“宗教大觉醒”。每一次“宗教-政治周期”都包含“宗教复兴阶段”，“政治影响力上升阶段”和“对主要政治方案的挑战不断增加的阶段”，在后来两个阶段的参与者并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徒，如下表1-1所示：

表 1-1 美国四次大觉醒的发展阶段

	宗教复兴阶段	政治影响力上升阶段	对主要政治方案的挑战不断增加的阶段
--	--------	-----------	-------------------

第一次大觉醒 (1730~1830)	1730~1760年:宿命论的影响减弱;认为罪人天生是可以获得拯救的;仁慈观的兴起	1760~1790年:对英国的腐败展开攻击;美国大革命	1790~1820年:革命联合战线瓦解
第二次大觉醒 (1800~1920)	1800~1840年:认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对罪恶的外在和内在斗争来得到上帝的恩典;仁慈观被广泛接受;相信千福年的人急剧增加。	1840~1870年:反奴隶制运动、禁酒运动和本地保护运动的兴起;对南方腐败的攻击;内战;妇女选举权运动	1870~1920年:南北战争前的福音教领袖被取代;达尔文主义危机;城市危机
第三次大觉醒 (1890~?)	1890~1930年:从强调个人罪恶转向强调社会罪恶;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更为世俗化	1930~1970年:对大公司和富人的腐败展开攻击;劳动改革;民权和女权运动。	1970年~?:对自由主义改革进行攻击:平等权宪法修正案受挫;抗税运动兴起;基督教联盟和宗教权运动中其他政治团体的诞生。
第四次大觉醒 (1960~?)	1960年~?:宗教体验的再次出现及重申《圣经》中含有可体验的内容;重申个人罪恶观	1990年~?:对物质崇拜者的腐败进行攻击;珍爱生命、尊重家庭和媒体改革等运动的兴起;要求学校增加更多培养价值观的课程;对福利政策进行攻击	?:

简化而言,福格尔认为,四次“大觉醒”是相互有重叠的“宗教-政治周期”,在重叠阶段上一次和下一次“大觉醒”的支持者会发生冲突和合作。第一次大觉醒从1730年到1830年,它导致了美国独立建国的革命。第二次大觉醒大约从1800年到1920年,它的宗教复兴阶段强调奴隶制不是“上帝第二次降临”的适当环境,导致了反奴隶制运动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南北战争。它的神学理论认为,每个人都能通过与邪恶进行顽强的内部和外部斗争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其社会含义是“贫困是个人罪恶的代价”。加上此时期美国未开发的地域广袤,就业机会丰富,因此,第二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是强调“机会平等”。第三次大觉醒从1890年开始,至今还没结束,而是处在和1960年开始的第四次大觉醒的重叠时期。第三次大觉醒的宗教理论“社会福音派”认为,“贫困不是是个人罪恶的代价”,而是社会条件造成的。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1960年代约翰逊“伟大社会”的福利国家理念体现了第三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条件平等”。1960年开始的第四次大觉醒则又回到第二次大觉醒的社会伦理观——“机会平等”。由于第三次大觉醒在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营养过剩导致的疾病已经超过营养不良),人的退休时间大大增加,第四次大觉醒的重点在于解决人的“精神资产”(“spiritual assets”)的匮乏和不平等问题(福格尔总结了“目的感”,“机会识别能力”,“主人翁精神”和“工作伦理”等15种“精神资产”),使“人的自我实现达到民主化”。而精神资产的配置不能简单靠政府税收的再分配转移支付,而是需要一种“个人责任伦理观”。福格尔书中的表5.2说明了人一生中自由支配时间增长的趋势,从而“自我实现”成为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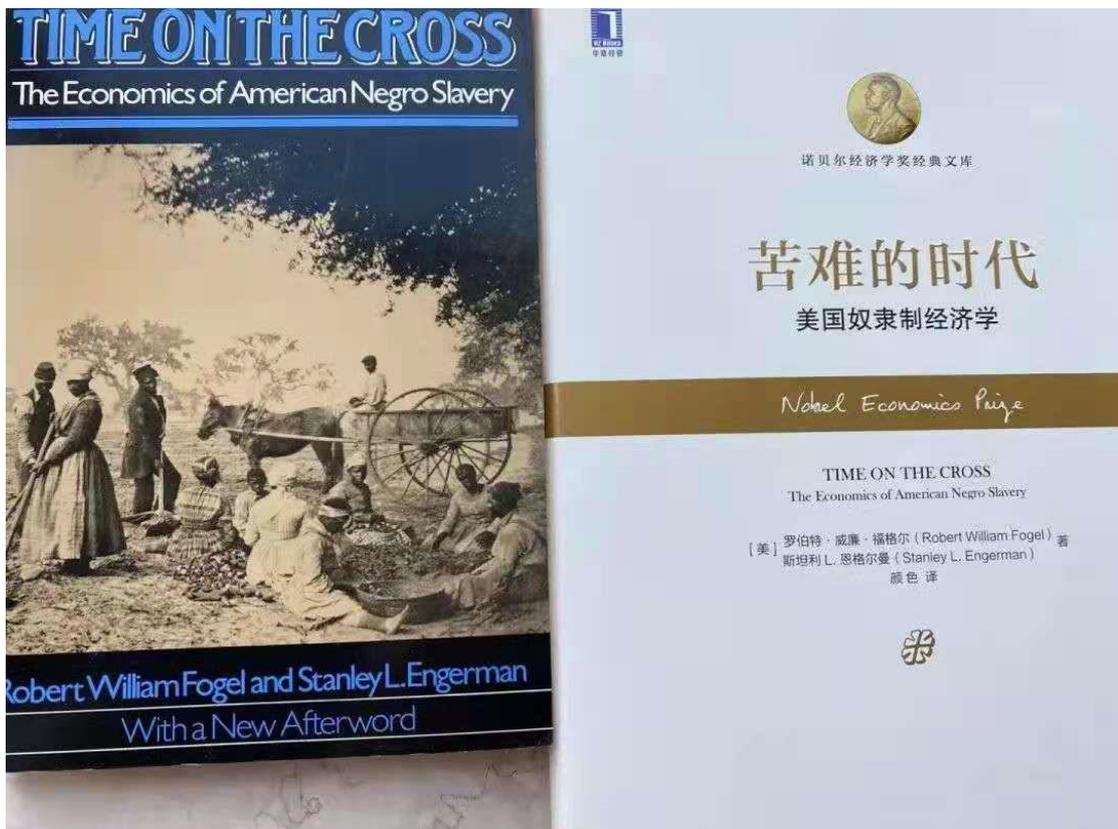
多人的首要人生问题。

表 5-2 对终身自由支配时间分配趋势的预测

(单位:小时)

	1880 年	1995 年	2040 年
终身自由支配时间	225 900	298 500	321 900
终身必要劳动时间	182 100	122 400	75 900
终身自愿劳动时间	43 800	176 100	246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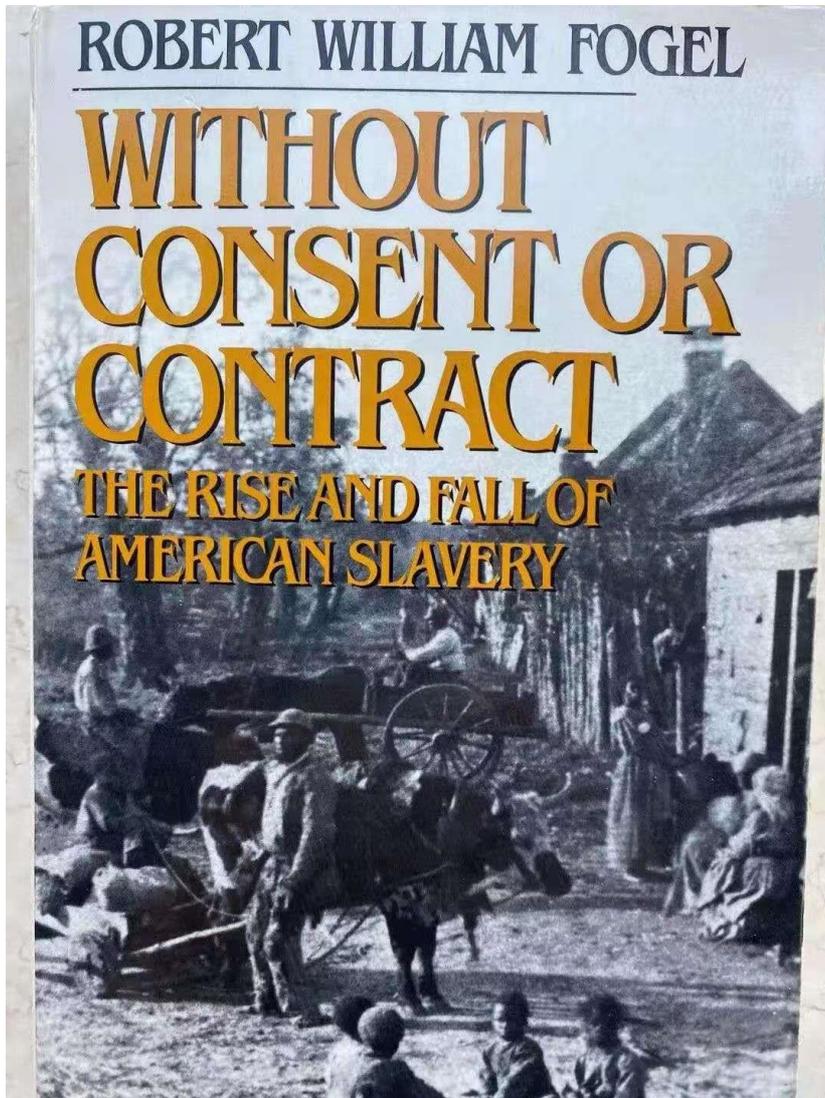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作为开创了计量经济史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为何如此注重“宗教-政治”周期呢?这和他的政治,学术和思想经历有关。福格尔 1948 年本科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校时是“马克思主义讨论组”的主席,毕业后从事了 8 年“美国民主青年”(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的专职组织工作,该团体的前身是美国共青团(<http://cornellalumnimagazine.com/red-cornell/>)。1956 年,受到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刺激,福格尔退出了共产主义运动,转向以严谨的学术研究推动人类进步事业。1974 年,他和另一位经济学家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合作出版了“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学”一书,将计量经济学系统地运用于奴隶制史料,发现奴隶制的某些经济指标(如利润率,生产率和奴隶寿命)并非原来流行看法认为的那样差。



(“苦难的时代”中英文封面)

此书的出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认为福格尔和英格曼是在为奴隶制辩护。当然,这绝非作者的本意。经过 15 年的思考,福格尔个人又于 1989 年出版了“未经同意与合约:美

国奴隶制的兴衰”一书，强调生产率高并非一定好，奴隶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失败，而是被 1820 年代宗教运动引发的 1850 年代政治重组而废除的。虽然此时福格尔尚未使用“大觉醒”的概念，但该书第 10 章可以被理解为对“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政治周期”的研究。



（“未经同意与合约”的英文封面）

美国废奴运动最初由加里森（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Lloyd_Garrison）1820 年代在福音新教内部发起（<https://en.wikipedia.org/wiki/Evangelicalism>），但支持者不多。1848 年，福音新教的激进废奴主义者成立“自由土地党”（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ee_Soil_Party），标志着“第二次大觉醒”从宗教复兴阶段发展到政治重组阶段，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俄亥俄州参议员萨蒙·蔡斯（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lmon_P._Chase）。蔡斯进一步认识到，应该把当时两大政党民主党（可追溯到杰佛逊）和辉格党（可追溯到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中反对奴隶制的力量重组为一个新的政党，这就导致了 1854 年“共和党”的成立。后来蔡斯担任林肯的财长部长（后来又经林肯提名担任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照片出现在 1 美元的钞票上。



(1 美元钞票)

在“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的未来”一书中，福格尔认为“第四次大觉醒”的发展和“第二次大觉醒”最为相似。他说 1979 年成立的福音派组织“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al_Majority)，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al_Majority）类似于“第二次大觉醒”的宗教复兴阶段的加里森，而 1987 年成立的福音派组织“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 of America](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_Coalition_of_America)）则类似于“第二次大觉醒”的政治重组阶段的蔡斯。福格尔的原话值得较详细地引用：

“1979年出现了道德多数派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使狂热宗教的信徒们联合起来，发动一场包括反对堕胎、恢复学校祷告以及消灭色情在内的全国性政治改革运动。尽管道德多数派在1984年的选举中非常成功地使宗教选民大量地从民主党转向了共和党，但是，与19世纪80年代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所领导的反奴隶制运动一样，该组织在宗教理论上过于僵化，不清楚自己主要关心的是教会问题还是更广泛的政治选举问题，而且将注意力过分地集中在了堕胎问题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宗教丑闻的打击之后，道德多数派组织于1989年瓦解了。1990年，一个范围更广泛、被称为基督教联盟的组织取代了它的位置。

基督教联盟与道德多数派的区别在于，前者更明确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方面，更愿意在关键问题上让步以扩大联盟的势力，在宗教理论上更为灵活，而且与主流教会中的狂热宗教人士有着更融洽的关系。为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基督教联盟把建立传统家庭的问题放在了堕胎问题之上。通过把减税和精减政府机构等内容纳入到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中，基督教联盟还向经济保守主义者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使得上述内容与自己的个人责任感联系起来。基督教联盟的这种减少僵化、加强问题针对性的制度改革使得人们想起了一位政治技巧娴熟的反奴隶制斗士——萨蒙·蔡斯（Salmon P.Chase）当初所做出的妥协。萨蒙·蔡斯是一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他后来担任了该州的州长。19世纪40~50年代，萨蒙·蔡斯与以前的对手联合建立了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后来又以最低纲领派的反奴隶制方案为基础建立了共和党。

在经历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政治兴衰后，第四次大觉醒运动的动力得以持续下来。该运动在策略方面灵活性的增强，联合阵线的扩大（吸收更多的主流教派、犹太人和黑人）以及民主党人对该运动改革方案日益敏感的反应等等都说明第四次大觉醒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将持续存在。如果我们对狂热宗教运动不理解的话，就将无法理解今后政治、伦理道德的发展趋势及经济的发展状况”（“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的未来”中译本第 33 页）

福格尔特别指出，“最重要的变化在于，那些长期以来对种族问题持保守观点的教会（比如摩门教和主要由白人参与的五旬节教等）正积极地对美国黑人、拉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进行传教。最近，白人和黑人五旬节派联手组建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北美五旬节教会（Pentecostal/Charismatic Churches of North America, PCCNA）。这说明，与过去不同，

现在的狂热宗教并没有破坏而是促进了种族间的和谐统一”。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站出口民调(exit poll)显示,白人福音新教徒中76%的人投票给特朗普,24%的人投给拜登(<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11/03/us/elections/exit-polls-president.html>)。有不少支持民主党的评论者据此认为特朗普的支持者都是白人种族主义者,但如果我们从福格尔的“第四次大觉醒”的视角来看,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福音教徒的主体是追求人生意义,而非宣扬种族主义。实际上,特朗普2020年在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中得票的比率是历届共和党总统中最高的,如果支持民主党的媒体说特朗普的支持者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话,那他们也得说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的支持者更是白人种族主义者。但这些媒体并没有指责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主义在美国不存在了,而是说无法用白人种族主义来简单地解释特朗普的支持者。(参见本公号第385期 Michael Lind “治愈煽动民粹主义”对为何不能把特朗普支持者的主流视为法西斯主义者和白人种族主义者, 链接)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的翻译质量总体较好,但有一个关键词翻译错了,“religious right movement”被译为“宗教权运动”,其实应该是“宗教右翼运动”。这一误译使得中文世界的读者不容易把握福格尔的一个重要看法:虽然“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联盟”在和共和党的政治联盟意义上可以说是“宗教右翼运动”,但美国历史上福音教各派的主体是左翼进步的。且不说第二次大觉醒中的废奴运动和第三次大觉醒中的“社会福音”运动,最明显的一个近期例子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建立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1960年代公民权运动的关键组织(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ern_Christian_Leadership_Conference)。金的名字中的“路德”(他父亲从 Michael King 改过来的)也反映神学理论在金的思想中的重要性。福格尔认为,美国福音新教往往站在追求和扩大深化平等与民主的社会运动前列,是因为美国福音新教各派的内部治理结构(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gregationalist_polity)不是如罗马天主教那样自上而下任命,而是由基层教会(congregation)聘请牧师,所以基层教会会对技术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道德文化危机反映比较敏感,成为“宗教-政治周期”的先行者,而“政治重组”阶段的参与者大都不是教徒,因此“大觉醒”和“世俗化”并不矛盾。马丁·路德·金就是福音教中浸礼派(Baptist)教会的牧师。浸礼派是美国福音新教的七姐妹教会之一(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inline_Protestant),被认为是1960年开始的“第四次大觉醒”的宗教代表人物杰瑞·法维尔(Jerry Falwell S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rry_Falwell_Sr.)也是属于浸礼派的牧师。他从原子弹和核废料以及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提出了一系列人生意义的根本问题,成为第四次大觉醒对“人的自我实现”的精神追求的起点。

根据对前三次大觉醒的政治重组阶段的深入研究,福格尔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第四次大觉醒”必然一直以共和党为主要推手,虽然“道德多数派”和“基督教联盟”在1980年代首先在共和党那里找到了政治支持。他说:

“国会中民主党多数派对克林顿讨好白人福音教徒的做法表示了反对。这表明,在民主党内部,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要多于对纯粹政党问题的关注。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共和党可能会继续成为第四次大觉醒时代领导人政治改革的主要工具。然而,克林顿、戈尔及少数重要的民主党人士所反映出的灵活性使人们注意到了以下事实:第四次大觉醒时代所出现的许多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也包含了第三次大觉醒时代的内容。比如,“性骚扰”或许是来自于女权运动时期的一个激进口号,但其内容可被看成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有关,而对性侵犯行为的界定则与人们希望重新回到传统价值观念上来的愿望是一致的。持有两种不同道德观的许多人都对其他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发展教育、遏制媒体中色情和暴力的泛滥、取

消由政府所支持的赌博行为、控制和打击毒品的走私和使用等表示赞同”。（“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第 35 页）

在此，我们看到福格尔提出了第三次大觉醒和第四次大觉醒的支持者在冲突之外也有合作空间的重大问题。“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出版于世纪之交的 2000 年。此后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内部的分歧日益显著，甚至不难想象出现类似 1850 年代的“民主党”和“辉格党”中对一些议题有相同看法的派别重组成新的政党（如同 1854 年新的“共和党”）的可能性。桑德斯参议员原来一直是独立人士，2016 年以民主党身份参加总统竞选提名失败后成为民主党内的激进左派，他对 2008 年后小布什和奥巴马总统用公共税收救助大企业和大银行的批评其实与共和党内的茶党没有根本区别，而共和党的建制派则出现了“永不特朗普”运动(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ver_Trump_movement)。民主党在参议院的领袖舒默 (Charles Schumer)2014 年明确指出，由于共和党内的基层茶党的存在，“商界现在更接近民主党主流，而非共和党”（<https://time.com/2977659/chamber-commerce-2014-elections-tea-party-republican/>）。舒默这一说法可以从“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的研究得到佐证。在“婆罗门左派对工商右派”一文中（<http://piketty.pse.ens.fr/files/Piketty2018.pdf>），皮凯蒂对 2016 年美国大选投票站出口民调（exit poll）做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而不是如很多报纸直接报道各阶层选民投给各党的比例），发现最高收入的 10% 选民和最高学历的 10% 选民中都有超过 50% 的人投给民主党，这是 1980 年以来的首次，以往的格局是高收入选民中的多数投给共和党，高学历选民中的多数投给民主党。皮凯蒂认为，这可能预示着美国政党结构将发生大重组，出现“全球主义党”（高收入和高学历）和“本土主义党”（低收入和低学历）。

美国政治重组可能性的最新例子，是对近来散户通过抬高游戏驿站 (GameStop) 的股价来挑战华尔街对冲基金的做空行为的政治反应。共和党的福音教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和民主党的激进左派众议员 AOC (全名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对此有一致看法，都反对 Robinhood 平台限制散户购买游戏驿站股票（但不限制卖出）的破坏“机会公平”的行为。



(Cruz 的推特)

本文通过介绍“大合流”，“故土的陌生人”和“第四次大觉醒和平等主义的未来”三本书，来试图理解支持特朗普的 7400 万选民中的三大构成，即在全球化“大合流”过程中受损的制造业工人阶级，共和党的基层茶党成员以及受“第四次大觉醒”激发的各层人士（这些人士虽然目前支持共和党候选人，但“第四次大觉醒”的内在逻辑并不指向任何固定政党）。不论 2 月 8 日美国参议院开始的弹劾特朗普判决结果如何，美国政治大重组的趋势都是不可避免的，值得关心美国，中美关系和人类命运的人士密切关注。